

“口述历史 见证成长” 郑商所发展亲历者 系列专访

系列专访之一：期货市场试点出台始末

记者 曲德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至今4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期货市场产生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价格由政府制定，不会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构建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迫切性日益强烈，这成为中国期货市场萌芽的经济和社会土壤。

在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常清教授看来，中国期货市场在建设之初就自然蕴含了两个发展目标：一是配合价格改革，用市场的手段为基础商品定价，形成中国大宗商品价格体系；二是将中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国际定价中心，拥有定价权，大宗商品定价不再受制于人。

“以2018年为分水岭，经过前30年的开拓进取，期货人已很好地完成了第一个目标。未来，我们将致力于把我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国际定价中心而奋斗，这是我们期货从业人员的‘中国梦’。”常清在接受期货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价格改革孕育期市萌芽

198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到现代期货发源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进行访问。国家主席亲自拜访一家期货交易所，这绝对是有象征意义的，表明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国外市场经济价格形成机制的关注。

1985年，常清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从事价格政策和价格改革的方案研究。彼时，价格双轨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所谓双轨制，即同一种商品有两种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计划价格，超产部分则按市场供求关系定价。常清认为，双轨制走的是一条过渡性道路，它引导了价格改革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迈进。

问题亦相伴而生。

在短缺经济大背景下，流通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同一商品市场价格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计划价格的乱象，“计划内倒计划外”的大量皮包公司应运而生，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争论随之而来。常清回忆，当时部分改革者认为价格改革失败了，主张退回计划价格，仍由政府定价。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为代表的改革者则认为，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借鉴国外经验，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1987年，受领导委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田源和常清分赴美国和日本，考察美、日商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回国之后，田源、常清等人向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建议，中国应建立期货市场，形成市场价格，合理配置资源。

1987年，美国培基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分公司副总裁杨亮瑜访问北京，向政府高层建议，在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利用期货交易保值。与杨亮瑜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陈宝璜。

1988年2月10日，李鹏总理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

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特别是蔬菜和猪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这一批示，连同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市场，探索期货交易”的发言一道，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和探索阶段从此拉开帷幕。

期货试点花落郑州

为落实好期货市场的研究工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 1988 年共同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常务干事田源、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司长杜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咨询研究员常清，还有国家体改委流通司的同志等。

1988 年年中，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第一个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我国试行期货贸易，探索设立期货市场问题，已经可以提到改革的日程，有条件抓紧展开研究和试点准备工作。该报告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计划于 1988 年年底之前在全国 2—3 个有条件的省市开办试验性的期货市场。李鹏总理随后批示：“同意试点，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方案。”

为了选择试点品种，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邀请了相关部门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不同的观点碰撞激烈，有观点认为双轨制价格乱象频发，不能再搞期货试点；也有观点认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不宜搞期货市场。而彼时粮食价格暴涨暴跌，昨天买粮难、今天卖粮

难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商业部，因此商业部表示支持期货试点，并最终加入期货研究工作小组，共同对粮食品种期货交易进行探索。

商业部的支持与参与，使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得以扩容，包括时任商业部研究所所长的张其泮及赵尔烈、朱玉辰等同志均加入到工作小组中。

确定粮食期货为试点品种后，选择试点地区提上议事日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联系了广东、上海、河南、河北、山东、吉林、四川、湖南、湖北等多个省市，涉及小麦、玉米、生猪、水稻等多个期货品种，最终河南、上海、四川、吉林、湖北的粮食部门和物资部门成立了地方性、部门性的研究小组，研究建立期货市场的方案。

1989年1月10日，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第二个报告，提出发展期货市场的思路：大力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交易，用期货机制改造远期合同，改造批发市场。工作小组同时提出：试办期货市场必须坚持积极稳妥，走规范化、法律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子，不能一哄而起，要成熟一个试点一个，逐步探索前进，以便让期货市场真正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那个年代，期货市场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争论渐息。期货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无关，允许期货交易试点的共识逐步达成，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部门和地区对期货交易的负面看法仍占据相当位置。

从现货走向期货

1990年10月12日，在中国期货业发展历史上无疑是值得书写和纪念的一天。

是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总裁为李经谋，这是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在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全国性批发市场试点。由此，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正式拉开帷幕，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常清心中仍有遗憾，此前所有设计都是按照期货交易所进行的，最终呈现的却是“批发市场”。“中国改革开放一贯奉行渐进路线。决策者希望中国能走一条和国外一样的道路，从现货起步，过渡到中远期交易，最终实现期货交易。”常清说。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自开业之初就实行了诸多国际通行的期货交易制度，包括会员制度、保证金制度、集中交易制度、公开竞价制度、集中环形结算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为市场的升级夯实了基础。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从现货交易起步，过渡到中远期交易，最终实现期货交易这“三大步”，国外用了上百年时间，而郑州将这一过程缩短到两年半。“郑州价格”“东方芝加哥”开始为世界瞩目。

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锣声敲响，当日第一场交易，以拍卖方式成交粮油1.95万吨；1991年3月22日，第一笔远期合同顺利签署，成交未收获小麦50万公斤；1993年5月28日，启用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名称，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当日成交粮油期货1.854万吨。

“三年间，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长期驻守郑州，与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裁李经谋等同志一起，借鉴国际市场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重新设计期货合约、交易交割规则。”常清说。

“在此期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格罗斯曼先生和张桂英女士给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他们多次来中国，来郑州，将国际市场经验向我们倾囊相授。”常清说。

采访结束后，常清告诉期货日报记者，现在很多人将他和田源称为“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这一荣誉他不敢独享。应该说，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是一批创始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一批期货人共同谱写了中国期货市场初创阶段的历史。

回忆中国期货市场的初创史，常清认为，当时部委和地方政府改革者们求真务实、敢闯敢试的工作精神是中国期货市场得以建立的关键，包括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商业部部长胡平，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安志文和河南省副省长秦科才、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昌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裁李经谋等同志都为推动期货市场的建设付出满腔热血和汗水。

常清在他撰写的《期货交易之道》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没有人去想权利和个人利益。引以为傲的是，我在国务院研究机构工作的8年里，参与推动了放开价格管制的改革，建立了形成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期货市场。”

系列专访之二：于无声处听“经谋”

记者 王伟

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作为我国第一个引进期货机制、规范化的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一时间世所瞩目，被认为是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

1993年3月，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母体上，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呱呱坠地，5月28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形成期货、

现货协同发展的“郑州模式”。由此，郑州成为新中国期货市场的发源地，郑商所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

2018年7月25日，作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商所的主要缔造者，李经谋接受了期货日报的采访。回望中国期货市场激情燃烧的初创岁月，李经谋说，无论是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还是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没丢河南的脸，为国家争了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淡泊，溢于言表。

梅花绽放春消息：粮食期货课题组落地河南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改革春风吹拂下，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在粮食领域表现为国家订购和议价收购的“双轨”运行——计划经济的元素还在，但市场经济早已春潮涌动。

“改革开放的起点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发端实际上就是粮食。”李经谋向期货日报记者回忆说，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领域深化改革，开始实行“双轨制”，一部分实行国家订购，即国家和各地农民签订收购合同；没有纳入国家订购的粮食，则实行议价收购。李经谋说，这种“双轨制”不单单用于粮食领域，后来还延伸至棉花、兔毛等农产品。

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是显而易见的，市场上“议价粮”越来越多，粮食供求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粮食增产，价格就会下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种植积极性；农民种得少了，粮食供不应求，价格又会涨上去。基本是两年增收，两年歉收，五年重复一个周期。”在李经谋看来，粮食价格年度之间波动较大，这种往复循环，很明显是粮

食领域出了问题，价格规律的自发调节功能已经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

粮食问题不仅仅反映在价格波动上，仓储、流通等方面也存在为题。“改革开放前，我国粮食一直短缺，市场、仓储体系建设比较落后，既不健全，也不完善。改革开放后，粮食大丰收，粮食部门甚至没有库容存放收购的粮食。”李经谋说，粮食问题在河南尤为突出，因为河南不仅是粮食生产大省，也是出口大省，在国际市场没有话语权，“归根结底就是价格体系问题”。

粮食领域出现的问题，不仅让各级领导很困惑，粮食部门更是饱受“夹板气”：今年“卖粮难”，明年“买粮难”，资金不够“打白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压力很大。对此，河南的粮食部门感受尤为深刻。如何走出粮食生产、流通和价格恶性循环的怪圈？一些境外专家“在粮食市场引进期货交易机制”的提议，立即引起国家的重视和国内相关专家的共鸣。

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价格组”，后更名为“市场流通部”。这个部门汇聚了多位期货市场的元老级人物，如田源、常清、廖英敏等。同年，在中央有关部委会的指示指导下，河南省成立粮食期货课题组，课题组设在河南省粮食局。

“当时情况下，大家对期货都一无所知，但听国外专家介绍这个机制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李经谋说，引进期货交易，能为市场提供粮食预期价格，如果生产者知道预期价格，就不会一窝蜂种植。“预期价格的指导作用，能够熨平粮食市场年度之间的价格波动。粮价波动小，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好处。”

肩负重要使命的粮食期货课题组以及后来的期货试点为何能花落河南？李经谋告诉记者，当时除了河南，还有广东、湖北、四川、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也开展了期货市场课题研究，但只有河南坚持了下来，提供了方案，并最终获得国务院批准。“首先是粮食有一部分价格放开了，这是前提条件。价格不放开，期货就搞不起来。此外，河南省的领导大力支持，期货试点品种为小麦，河南既是主产区，也是主要消费区，还有交通优势。当时国内期货研究对标的是CBOT，郑州的地理位置和芝加哥也很相似。”李经谋分析说。

小荷才露尖尖角：继续改革开放的“报春鸟”

1989年，国家九部委联合签发报告，提出在郑州建立国家粮食批发市场。

1990年6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1990年6月25日，商业部联合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宣布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是商业部成立历史上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990年10月12日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的日子。当日，四十多位国家部委相关领导出席开业仪式，国际国内专家云集。开业时的盛况，早已融入李经谋的记忆，但在国际上产生了怎样的巨大影响，李经谋是后来才慢慢了解的。“那时信息不发达，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世界各主流媒体、各大报纸的报道可以说铺天盖地，都把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开业看成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刚开业几分钟，美国之音就播发了新闻；3天后英国《独立报》以‘资本主义种子在中国萌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李经谋说，在此之前，

德国媒体甚至斩钉截铁地认为中国不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立，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对于“资本主义种子在中国萌芽”的新闻标题，李经谋说，英国《独立报》犯了一个错误——社会主义必然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必然是市场经济。“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是开启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

李经谋坦诚地表示，当时没想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立在国际上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后来很多评论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报春鸟’，是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评价是客观和中肯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立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比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郑商所的前身）晚了两个多月。从这个层面上看，郑商所被称为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开端，是当之无愧的。”

为什么是先成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而不是直接建立期货交易所？在李经谋看来，当时直接建立期货市场的条件还不具备，先建立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有利于向期货市场过渡。“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现在有了自由销售的粮食，才形成了市场，但这个市场是单一的。需要建立规范化的市场，引进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期货市场的试点。”李经谋说，新成立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跟传统的现货市场完全不一样，引进了期货交易机制，如会员制、保证金制度、统一结算制度等；有规范的交易规则，实行连续交易、竞价交易等。而且，期

货和现货共同成为核心驱动，虽然名义上是现货市场，但其价格体系却被用来指导全国的粮食价格，期货市场的雏形已经慢慢形成。

创业艰难百战多：从没考虑过失败的问题

成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引进期货交易机制，对河南来说，是做成了一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事。但在市场建成以前，乃至成立郑商所之前，这件事情并不被外界看好。诚然，河南有粮食产区、销区，以及交通等诸多优势，但劣势也显而易见：经济基础落后，信息比较封闭，社会形象当时也不如人意。李经谋回忆说，参加粮食系统的会议，有外省的同行开玩笑说：河南粮食领域搞出了“鹿邑经验”“灵宝经验”，现在又搞什么花样……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前 10 多天，李经谋才接到任命通知。作为新生事物，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前景并不明朗。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蓝图，困难可想而知。这无疑是一个“烫手的山药”，更是一副重担子。彼时，李经谋任职河南省商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河南省粮食局常务副局长。在河南粮食领域，他是“文革”结束后获提拔的第一人，被认为前途无量。亲戚朋友或当面或打电话劝他深思熟虑：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能有什么前途！

重担在前，挑不挑？李经谋几乎没有犹豫就挑起了责任，这一挑就是 10 年。任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任前，组织找他例行谈话，前后五分钟不到就结束了，干脆利落。李经谋向找他谈话的领导表示，一是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二是尽职尽责干好工作；三是如果自己认为不称职，会立即辞职。“由我担任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任，是河南省委常委会议的决定。我是党员，首先要服从组织安排。尽管发展前景不明朗，但我知道这是过渡，后续要建立期货市场，开创新的事业。

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放在河南，又交到我手上，我就得想方设法干好，不给河南丢脸，为国家争光。”

虽然李经谋协助负责过粮食期货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对市场筹建的各项前期工作也不陌生，但从接到任命通知到开业只有 10 多天，李经谋夜以继日，加强学习，恶补知识，以做好开业前后堆积如山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顺利开业是当时的第一要务，但开业之后如何促进发展，也是重中之重。为此，我们提了三个口号，也是三项任务：一切为了市场开业，一切为了市场启动，一切为了市场发展。”李经谋当时还跟同事打了“预防针”，所有的个人事情，首先要和这三项任务对照看看孰轻孰重，如果个人的事情更轻，即使提出来也不会得到批准。

李经谋回忆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刚成立时，办公室是租来的，条件差，要什么没什么。很多人住在粮食厅家属院，距离办公场所 20 里开外。中午只能在办公室休息，一人买一张凉席，席地而卧，有人被螨虫咬得浑身起了红疹，就买点药在办公室撒撒。有人父母生病，午休时蹬着自行车回家，照顾完老人，又蹬着自行车回来上班。“条件这么艰苦，但没人叫过苦喊过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认为这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为新兴事物，行业对新成立的粮食批发市场并不适应，交易量很少，发展遇到很大困难。怎么办？“我们从自身找原因。我们的宣传还不到位，没有让大家对市场有充分认识；我们的服务需要提高，要千方百计考虑服务问题，牢固树立服务思想。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运输问题是企业参与粮食批发市场的瓶颈问题，如何突破瓶颈？除了一次次向铁路部门申请支持，还借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 1992

年视察之机，争取到每月 200 个车皮的运输支持，吸引了企业参与交易。”李经谋说，为促进市场的发展，国家还专门成立了粮食批发市场协调领导小组，一个月召开一次协调会。此外，更是在服务上广开思路，为卖家找买家，为买家找卖家，脚踏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干好，用协商交易、组合交易、代办结算等创新模式，吸引企业参与到郑州市场来；建立集成信息网，为企业提供设备，培训人员，对表现优秀的企业给予奖励；为参与的企业向国家税务局申请免印花税；租用卫星通讯系统，不惜代价利用当时最先进的通讯方式每周向全国发布批发市场成交价格。

在李经谋看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合同见证，代办运输，代办结算，提供担保”等一揽子创新服务，在当时都具有开创性，倒逼铁路运输、商事制度、粮食仓储、银行结算等多个系统不断向前发展。

“直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运行一周年，实现稳步发展的时候，我还跟主管领导说，一年来一直是如履薄冰，就像坐在一口大缸的边沿上，缸里满满一缸水，稍有差池，就会掉进去，再没有出头之日。”李经谋坚定地说，虽然当时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根本没考虑过失败的问题，“听取来自各方的建议是一个方面，但更多还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

过程虽然千辛万苦，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具体的表现是，随着市场发展和办公需要，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购进了第一辆少林汽车厂生产的“亚洲牌”中巴车，虽然二十多人的座位常常要被塞进三十多人，虽然有一次刹车失灵，带着一车人呼啸着闯过红灯，虽然路况也不好，常常要忍受颠簸，但市场在快速往前发展，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快。

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信心有能力推出期货

到 1993 年，经过五年研究、两年实践，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推出期货交易已经到了火候。李经谋一直认为，在现货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期货市场完全可以获得成功。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

但李经谋当时的这一观点并不被专家看好。有专家认为，现代期货只能诞生在经济发达地区或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城市。很显然，郑州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有人折中建议，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不要急于推出期货交易，适度把合约标准化即可，不用一步到位。

甚至在 1993 年 4 月，距离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5 月 28 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的前一个月，有专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期货研讨会上当着几十人的面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推出期货不会成功。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试点过远期合约，再加上五年的基础研究，两年多的实践，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推出期货交易。”李经谋的底气，来源于已经成型的期货交易规则，在他看来，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既符合国际期货一般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期货交易规则，奠定了我国交易机制的基础。“目前中国期货市场所有的交易规则和主要制度规定，可以说都源自郑商所，后来虽然随着市场的发展，交易规则几经修改、完善，但大框架依然没变。”李经谋骄傲地说。

当然，这部期货交易规则的诞生，实属来之不易，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这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我们 1991 年年底就开始研究，当时不惜一切代价，用时将近一年。”李经谋回忆说，当时还专门成立了期货研究

小组，有找资料的，有搞交易的，有搞结算的，大家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往前推进对交易规则的研究和制定。

“我们考察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所，最终认为 CBOT 的期货交易规则最完善，交易一环扣一环。但 CBOT 交易规则多达 1800 多页，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显然无法照搬照抄。我们只能吃透规则，分出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怎样做好交易准备，过程如何衔接，怎样做好相关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把国情了解透，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交易规则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李经谋说。

交易规则初稿出来后，李经谋先请国内专家论证，又派一个副总带着团队去 CBOT 专门征求专家意见，一个月的时间，没去任何地方，就在 CBOT 与美国期货专家一字一句进行对照，符不符合国际惯例？能不能做到环环相扣？“论证的结果是符合国际惯例，可以实行。”李经谋说，对美国期货交易规则的学习和研究，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全方位的，包括去看定点交割仓库，“CBOT 的人很惊奇，说不知道接待了多少世界各地的学习者，但深入交割仓库，你们是第一批”。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创新意义的期货交易规则，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商所推出期货交易首日，成交量只有 1854 张合约，没过几天这一数字就超过 1 万张，几个月后增长到 10 万张。“付出有了回报，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还专门举办了一场酒会——我们成功了，在郑州推出期货成功了。”

问渠哪得清如许：在规范中求发展

从 1993 年推出期货交易到 2000 年，郑商所实现了稳步、规范、健康发展，代表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正确方向。1997 年，郑商所期货交易量占到全国的 56%。“在中国期货市场最艰难的时刻，可以说是郑商所的期货品种让期货界渡过了难关，保留了火种。”李经谋说。

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法规建设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郑商所能够实现稳步发展，可以说与李经谋坚持“规范、自律”“在规范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规范”等主导思想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自律经济。国外是先立法，再设立期货交易所，法治观念很强。当时我国虽然还没有期货方面的法律法规，但交易规则就是交易所的‘法律’，不能违背，要按规矩办事，贪污受贿、透露消息、操纵市场等，都是不能被容忍的。”李经谋说，郑商所发展之初就大力强调规范和自律，以规范来促进发展，以发展来促进进一步规范，“当时国内很多期货交易所发生了极端事件，但郑商所安然无恙，我总结原因就是规范、自律”。

除了规范、自律，李经谋还领导郑商所完善交易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在交易规则、技术等层面进行创新，为国际期货市场的发展，示范了“中国样本”。

比如，实行电子化交易。据李经谋介绍，当时国际上知名的期交所均使用传统的叫价方式，下单差错率很高，有时甚至超过 20%。国内如果出现这么多差错，岂不乱套？基于当时国内法律缺位、经验不足和投资者素质等方面的考虑，郑商所实行了电子化交易。

比如，实行 3 日涨跌停板制度。李经谋告诉记者，境外期交所对涨跌停板时间一般不做限制，因而会出现短时价格的大幅上涨和下

跌，带来极大风险。而郑商所规定，如果出现连续单边涨跌停板，3个交易日之后完全放开价格，为多空双方设置一条红线。

比如，1997年实行仓单标准化和无纸化管理。李经谋根据中国粮食期货交割的特点，通过找补升贴水将仓单标准化，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将有形的纸质仓单改造为电子仓单管理，适度减少了多点分库提货的现象，实现了集中就近交割，减少了交割成本，更有利于期货套期保值功能的发挥，被国际期货专家誉为“对国际期货市场做出的新贡献”。

再比如，实践现金交割（差价交割）。李经谋根据粮食商品量大价低和当时我国铁路运力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并成功实践了现金交割方式，走在期货市场的前列。

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由现货完成向期货市场的过渡后，李经谋提出了期货、现货两种机制同时运行、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郑州模式”。这种模式被国际期货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期货市场的成功模式，并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借鉴。

“我们还做了其他一些创新，比如设立风险准备金制度等。这些创新实施起来可以说磕磕绊绊，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正是因为我们的不断创新，美国斯坦福大学才和郑商所达成了长期合作。郑商所目前在世界的排名稳定在前十五位，最高排进前十，一些品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具有影响力的‘郑州价格’，这是最大的收获。”

心底无私天地宽：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郑商所是我们国家最规范的交易所，其前身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由国务院发文批准，可见国家对这个事

情慎之又慎。”在李经谋看来，郑商所前十年的发展历史，就是新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期货市场的正确发展方向。

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早期，经历了一个阶段的“野蛮”生长，清理整顿成为必然。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期货市场经历了两次清理整顿。在两次清理整顿过程中，郑商所不仅安然无恙，还实现了继续发展。在李经谋看来，清理整顿非常必要。“第一波清理整顿前，官方数字显示全国有54家期货交易所，实际上据说有200多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一些交易所甚至搞假仓单，违规违法。经过清理整顿，期货市场乱象得到遏制，风气大大好转。”

在两次清理整顿期间，对于郑商所，李经谋有足够的信心。“期货市场存在问题不在于期货本身，而在于管理规则。我们是国务院批准的期货试点单位，我们的期货交易规则符合国际惯例，在交易所管理方面，我们的规范、自律的指导思想，也符合依法治国的理念。郑商所从没出现过极端事件，但面对两次清理整顿，我们依然积极配合，需要完善的予以完善，需要改进的立即改进，各项工作一直往前发展，交易量也出现增长。追根溯源，做好自己的工作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也是化解风险的最好办法。在清理整顿期间，我们就是通过不停的工作，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风险，维护了市场形象，促进了市场继续前进。”李经谋告诉记者，在全国的期货交易所中，郑商所第一个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从交易手续费中每年提取一定的比例设立风险基金；出台了廉政建设十条规定，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称赞，成为全国期货市场的规范文件；顶住压力，对不交易的席位进行了清理，按规则办事；还致力于将郑商所打造成所有会员单位温暖的大家庭……

在任职郑商所期间，李经谋还主导推动了我国第一部地方性期货法规——《河南省期货市场管理条例》的出台。“当时没有全国性的期货法律法规，1994年，我们推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在郑商所期货交易规则基础上，按立法要求进行扩展，所有内容进入地方法规，期货市场自此有了法律依据，应该说这也是郑商所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

1994年，李经谋还创办了《期货日报》的前身——《期货导报》。“当时常清提出，期货市场是新兴市场，发展势头很快，参与的人员较多，需要一份报纸作为宣传阵地。”李经谋说，与其他期货交易所以及一些期货经纪公司协调后，由郑商所出资，筹建期货导报社。“当时的情况下，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一家企业创办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很不容易，大家做了不少工作。《期货导报》创刊时，我提了三条要求：一是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作为全国性报纸，不能是一家之言，不能专门服务郑商所，在排版中如果与其他交易所内容重叠，优先安排其他交易所；三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维护市场发展形象。对于他一手操持创办的期货日报，李经谋一直很看重，除了身体力行为之撰写高质量的文章，至今还珍藏着《期货日报》创刊号。

时至今日，《期货日报》一直秉承准确、全面、客观、权威的办报方针，坚守初心，与期货市场风雨同舟，见证和记录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宏大篇章。

蜡炬成灰泪始干：75岁前什么事都想干

“我绝对不会赖到必须退休的年龄再退休。”任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之初，李经谋就说过这样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步履铿锵十年路，在带着郑商所走过风雨，迎来彩虹的1999年，李经谋提出辞去郑商所的职务——第二年，他才到正式退休的年龄。

为郑商所鞍马劳顿的10年，李经谋殚精竭虑，本想退休后能够好好休整一下，但新的使命又落在他的肩上。2001年1月，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期货、现货管理体制分离，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与郑商所分设，专门从事粮食现货交易。李经谋受命组建新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一干一直到了2007年。

在此期间，李经谋主持了我国粮食现货交易的创新机制——栈单交易的研究开发工作，希望打通现货和期货的界限，实现两者的融合发展；他还主持编写了《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目前已经出版15卷，在国内外都有着很大影响，被认为填补了我国粮食研究的空白。作为主编，李经谋每年都要为此付出巨大努力，至少提前两三个月做功课，需要他撰写和完成的部分加起来十几万字，常常要忙到凌晨两点才睡觉。“75岁前，什么事都想干！”从不服老的李经谋，如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守望市场，辛勤耕耘。

无论是在郑商所，还是在重新组建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收藏都是李经谋割舍不下的爱好。李经谋参观过世界各地的交易所，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特别重视文化，重视历史。由此，他开启了一条提升郑商所文化品位的收藏之旅，设置在未来大厦的铜镜艺术馆，一度是郑商所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美国交易所的同行到郑商所来，触摸这些有上千年历史的铜镜，非常惊叹，连手都是颤抖的。”李经谋说，他不是作家，写不出这些铜镜背后的悲欢离合，但他认为，这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值得珍藏。

而在重新组建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李经谋还开办了古代粮食文化陈列馆，收藏有上千件与粮食相关的器具，包括加工的、仓储的、运输的，有些还是国家一级文物。比如一件“裴李岗文化”——新石器文化时期的器物，有 80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由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型的典型器物。此外，该陈列馆还收藏有解放区的粮票，以及粮食运输证明，非常稀有。“做这个陈列馆，是想搭建起人们认识古代粮食文化的桥梁，我们收藏的古代烤箱、古代炉子，都充满了老祖宗的智慧，经常有小学生过来参观。让大家了解中国古老的农业文化，对提高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知名度也有好处。”

“该干好的一定要干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采访的最后，李经谋说，他们那代期货人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拼搏过来的，个人的荣辱得失，只是过眼烟云。

系列专访之三：清理整顿夯实期市规范发展基础

记者 曲德辉

顿步回首，从 1988 年开始研究期货理论算起，中国期货市场已走过 30 年的风雨历程。30 年来，中国期货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风雨，逐步规范。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期货市场所迈出的脚步也日渐厚重扎实。

“中国期货市场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期货证券研究室主任廖英敏说。

期货市场试点 郑州拔得头筹

期货市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现货市场

的发育程度还不足，期货市场法规制度尚不健全，监管体制和监管模式仍在探索、投资者对期货交易仍不了解，中国期货市场也因此在此初创的 10 年间经历了从盲目发展到清理整顿的曲折历程。

在廖英敏看来，中国期货市场初创期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一是在没有全国集中统一监管、地方政府主导下建立的期货市场，管理上各自为政，运作中只重视短期利益、同业竞争；二是法规制度滞后于市场发展，只能频繁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

“中国期货市场的实践是从 1990 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1993 年在此基础上设立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开业开始的。”廖英敏说。

1987 年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将期货市场问题列入 1988 年重点课题计划，廖英敏作为价格组的成员，开始着手研究期货交易。1988 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与国家体改办流通司联合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价格组的田源、常清、廖英敏等人和体改委流通司的杜岩、刘俊英等人参与进来。

谈及期货市场第一家试点单位缘何花落郑州，廖英敏说，确定试点期间，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与很多省市进行了沟通，郑州最坚定、最积极。在召开期货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河南省由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昌基（后来升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带队，来了 8 名同志，包括河南省粮食局局长袁世民、副局长靖明宇，课题组的高适之和周伟民等，准备的材料也十分充分。最后，工作小组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在河南省进行期货市场试点。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郑州商品交易所）从开始酝酿思路到正式开业，遇到了很多困难与挑战。田源、常清、李经谋、李守堂、王献立等同志的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开拓性作用。”廖英敏说。

有评论如是说，回顾中国期货市场初创阶段的历史，田源、常清、廖英敏等人在政策研究、方案构思等理论层面为市场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李经谋、李守堂、王献立等人的贡献则集中在市场建设、市场监管等实践层面。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当各方还在争议“姓资还是姓社”等问题时，郑州凭着敢闯敢试、大胆实践的改革精神，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改革的步伐，促进了期货市场在我国的萌芽。

从盲目发展到清理整顿

1993 年 5 月 28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开业并推出规范化期货交易，中国现代期货市场正式登场。全国各地掀起了兴办交易所、建立期货公司的热潮，给市场发展蒙上了阴影。

仅到 1993 年年底，全国经批准设立的期货市场（含各种交易所和批发市场）50 多家，期货经纪公司 300 多家，期货兼营机构近 2000 家，交易品种 100 多个，从业人员 13.5 万人。

一系列问题随之暴露出来：各地方、各部门不顾条件争相设立交易所；有些外资及合资期货公司欺骗客户，出现与客户对赌、不把客户指令下到境外交易所场内的恶性事件；部分企业与个人盲目参与境外期货交易，损失巨大。

1993 年 11 月 4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1994 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请示的通知》。中国期货市场步入清理整顿阶段。

第一阶段清理整顿的措施有：建立统一的期货市场监管体系。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负责期货市场试点工作的指导和规范，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具体工作；中国证监会批准了 15 家试点交易所，对试点交易所进行会员制改造。停止了其他几十家交易所的期货交易，停止了一批期货交易品种，停止期货公司境外期货经纪业务及外汇期货交易，制定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

1998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清理整顿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清理整顿的措施有：对 15 家期货交易所进行撤并，仅在上海、郑州和大连保留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将交易品种由 35 个压缩到 12 个；提高期货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标准，期货公司不得从事自营业务。

坚持规范发展 加强风险管理

廖英敏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是有必要的。首先，期货市场当时已进入盲目发展阶段，市场各类主体均出现过热、过乱的行为；其次，从清理整顿的结果来看，引导了期货市场向正确方向发展，解决了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对行业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从 1993 年到 1999 年，期货市场经过 7 年的清理整顿和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今后期货市场的规范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廖英敏说。

在廖英敏看来，始终秉持“规范发展”是郑州商品交易所在期货市场清理整顿中得以保留的原因。她说，郑州商品交易所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是交易所的基本原则，并且提出“规范、自律”的风险管理思想，即“在规范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规范”，使郑州市场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期货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期货市场稳步健康发展的典范。

谈及郑商所近年来的工作，廖英敏说，她是郑商所第四届、第五届非会员理事，对当时郑商所理事会的工作较为了解。记得在 1999 年，期货市场即将度过清理整顿时期，步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整个市场成交清淡，各类投资者对期货的功能和作用还不够了解。郑商所理事会在那一年重点开展了投资者教育工作，理事长张学仁带着交易所理事多次到河南各小麦主产区，向农户、企业介绍如何运用好期货市场。李守堂总经理则邀请业内专家，通过互联网宣传期货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对于郑商所未来的发展，廖英敏认为，在中国期货市场 30 年的历史关口，郑商所要更坚定地走向国际，进一步提升“郑州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研究探索新的对外开放路径和方式。

当前，期货市场开放的步伐正越来越快。2018 年，期货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取消，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成功上市，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顺利启动，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 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工作也已进入立项审批阶段。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期货市场必将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建设正如火如荼，一个崭新的期货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正在开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希望从萌芽起步的郑州期货市场，肩负起新的使命与梦想，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系列专访之四：郑商所勇攀粮食市场化改革高峰

记者 曲德辉

惟改革者进，惟开放者智，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开放创新者胜。从现货批发到远期合同，再到期货交易，郑商所人勇立潮头，走出国门，激励创新，先改先试，披荆斩棘，不仅成为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引领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成为被广泛效仿的一个样本。

树立中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

1990年7月27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报告的通知》，一举将郑州推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沿。同年10月12日，我国第一个引进期货机制、全国性、规范化的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营业，这不仅意味着新中国期货市场的诞生，更标志着新中国走出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而统购统销、票证供应则是当时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在这一关键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同时也向全世界传出了一个积极信号，表明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原商业部副部长、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中国期货市场的主推手之一白美清说。

在白美清看来，当时在粮食批发市场中引入期货机制的战略意义，远远超出了粮食领域和期货领域本身。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改革开放备受世界瞩目的关键阶段成立的。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嗅觉敏锐的一些国外媒体由此判断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中国在朝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 1 小时后，《美国之音》便将此消息向全球发布，国外多家新闻媒体也进行了集中突出的报道，盛赞郑州市场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里程碑”。《亚洲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述：“开办粮食批发市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又一重要步骤，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家期货市场的起点。”

“中国期货市场的起步、郑商所的诞生是从粮食期货开始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郑商所为粮食市场化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期货市场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白美清说。

以现货批发起步 成功推出期货交易

1990 年 10 月 12 日，郑州诞生了我国第一个规范化的粮食现货合同；1991 年 3 月 22 日，我国第一份粮食现货远期合同在郑州诞生。1993 年 3 月 1 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启用“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名称，并于 5 月 28 日正式推出我国第一个农产品期货标准化合约，上市了小麦、玉米、大豆、绿豆和芝麻等 5 个交易品种。从现货批发到远期合同，再到期货交易，郑州商品交易所仅用了较短的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期货近百年的发展步伐。

郑商所理事会办公室原主任王成周，1988 年从河南省粮食局干部转变角色成为郑州粮油期货市场课题组成员。据王成周回忆，郑州市场成立之初，遇到过很多困难，当时主要是向白美清（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和秦科才（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汇报工作。他说：“白副部长负责中央机构的协调工作，秦副省长负责河南省内的协调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密切合作和鼎力支持，郑州市场的诞生和发展不会那么顺利。”

在白美清等领导的积极协调下，一份对当时铁路运输管理体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件诞生了。1990年11月20日，商业部粮食储运局、铁道部运输局联合发布《关于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交粮油运输问题的函》。文件明确，为保证在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交合同的履行，凡盖有“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运输计划专用章”的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发的准运证或铁路要车计划表，发运单位要保证货源落实，铁路要优先纳入月度货运计划。这对铁路部门按区域、按部门申报运输计划的管理方法提出了挑战。

同时，1990年12月11日，国家税务局也出台了国税函发(1990)1573号《关于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粮食交易合同免征印花税问题的批复》。文件指出，凡在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内进行粮食交易所签订并经该市场管理部门盖有专用章的合同，在1991年12月31日以前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一个交易平台出台专门的税收政策，在新中国的税收管理历史上较为少见。”当时的国家税务系统工作人员如是说。

勇当粮食市场化改革“开路先锋”

白美清曾公开表示，在全国粮食系统，自己参与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组建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国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粮食价格放开后，储备制度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非常重要，实践证明，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二是支持、推动了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成立与发展，为中国期货市场的诞生、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贡献了力量。

中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要实现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期，白美清等在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粮食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已将期货市场放在尤为重要的位置。白美清曾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粮食市场体系应该以星罗棋布的粮食初级市场为基础，以区域性的批发市场为骨干，以国家级粮食批发和期货市场为龙头，构成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完善流通体系。

“回头来看，当时建设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州商品交易所非常明智，正是有了‘郑州价格’和‘郑州模式’的总结和探索，我们在全国较快较好地展开了粮食批发市场和期货交易所的建设，有力促进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白美清说。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从现货批发到远期合同，再到期货交易，郑商所激励创新，披荆斩棘，不仅成为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引领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成为被广泛效仿的样本之一。

寄语郑商所人饮流怀源、不忘初心

听闻郑商所近年来通过“保险+期货”新模式服务三农取得了良好效果，白美清欣慰地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三农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我作为一名‘老粮食’，希望郑商所能够推出更多农产品期货和期权产品，坚持为三农服务，为国家粮食安全负责，不负国家重托。”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要培养中国式的国际大粮商。这就需要我们同时建设一个国际化的、有定价权的期货市场，推出更多农产品期货和期权产品，发挥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优势，为中国粮食业保驾护航。”白美清表示。

回顾郑商所波澜壮阔的创业史，白美清感慨万千：“我仍然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第一代郑商所人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用无悔的青春和奋斗铸就了曾经的荣誉和辉煌。我每到郑商所，都能感受到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使人活力倍增。”

28 年前，郑商所先改先试、白手起家。28 年来，郑商所慎思笃行、砥砺前行。白美清殷切希望，郑商所人一定要饮流怀源、不忘初心，把创建之初那种敢为天下先、勇做探索者的文化基因永远传承下去，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励精图治，筑牢基础，凝神聚力，再开新局，朝着全球商品定价中心昂首奋进。

系列专访之五：郑州市场蹚出了一个“未来”

记者 韩乐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研究探索期货。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副所长陈宝瑛建议，利用期货市场为对外进出口贸易进行保值，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载体和基础，我国不仅要建设规范化的现货市场，而且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试点单位，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市场发展，既是国家的既定目标，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要求。

确立新课题 探索逐步建立期货市场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中国现货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引入了期货交易机制，创立了第一家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此基础上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交易，正式创立郑州商品交易所。这一过程中，陈宝

瑛成为国内首次引入“期货”概念第一人，也成为国内期货市场的首位“启蒙老师”。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价格放开商品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内粮食、生猪等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农户带来了很大风险和损失，迫切需要市场有规避风险的机制。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决定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于1988年2月10日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要求“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特别是蔬菜和猪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成立研究小组开始研究期货市场，分别到美国、香港组织调查和研究。

期货市场研究小组成员陈宝瑛作为国内较早接触到国外期货市场的专家，凭借自己在香港参与期货市场的经验，早期开展了对期货问题的研究，提出国内应该逐步建立期货市场，使我们流通者、生产者、消费者避免价格损失。

1988年5月，期货研究小组向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研究报告，提出了可以在我国试行期货贸易的问题，计划在1988年年底以前，可在国内有条件的省市试办实验型的期货市场。5月26日，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方案”。从此，我国期货市场研究工作进入了理论探讨、方案制定、试点试验的新时期。

期货市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为了推进试点工作，为要办的试点工作做准备，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有关期货交易知识，相关的投教工作必不可少。1988年10月22日，全国首届期货市场培训研讨班在郑州举行。

研讨班上，讲师们结合国外的期货知识，对国外期货制度的研究、国内如何引进期货交易机制，作了一些初步探讨。作为研讨班上的主讲师、国家研究期货的专家，陈宝瑛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实践经验，系统介绍了期货市场的理论和实践，比较全面地把有关期货市场的知识，在较大范围内进行了普及。

1989年1月，研究工作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第二份研究报告。当时提出了可以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改造现货市场。随后，1990年10月，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神州大地宣告诞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粮食批发市场。远期合同的签订和发展，为郑州市场由现货市场向期货市场过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投身新行业 国内引入期货市场机制

20世纪80年代，陈宝瑛给外贸部建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条件逐步建立期货市场。国内应该逐步建立批发市场，然后发展期货交易所。作为试点单位，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市场发展，既是国家的既定目标，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要求。

陈宝瑛在20世纪80、90年代长期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并主管港澳地区经济、金融调研等相关工作，在香港的一些期货交易经历更使他成为国内期货市场的探路先锋。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1976年10月，陈宝瑛到香港后不久，原对外贸易部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让他从事期货和证券交易活动。离开熟悉的研究工作岗位，陈宝瑛投身到了期货交易崭新的行业中来。据他回忆，当时香港是国际经济贸易中心，期货市场非常发达。

“那时，国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出口商品一般都要根据国家的计划量来进行。我们进口一些商品，往往再高价买入、价低卖出。这种情况下，价格对我们来说损失很大。后来我就利用香港的公司，对外进行套期保值。做期货的6年时间里，给国家避免了很多损失，节约了大量外汇。”陈宝瑛表示。

曾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参观拜访过几次，陈宝瑛了解到，1848年开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成立，已经100多年历史，其发展也经历了由现货市场远期交易合同到现代的期货市场这样一个过程。

“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市场交易的多元化。除了一方面加快现货市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外，另一方面就是要引进期货市场机制，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长期交易功能来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把不完整的市场调剂机制，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市场调节机制，以减少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破坏性。”陈宝瑛表示。

在筹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过程中，令陈宝瑛印象最深的是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包括国务院、商业部、河南省领导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期货专家学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议及课题研究，提出在我国创建粮食批发市场和期货交易所的实施方案。在他看来，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起步现货交易 逐步发展并引向期货交易

粮食批发市场的发展方向和最后的归宿是期货市场。为什么中国不能马上开办粮食期货交易所，而是要在现货批发市场的基础上发展并引向期货交易呢？

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新闻发布会”（这是商业部自成立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解释说，从市场发展的历史看，不经过有组织的现货批发市场，粮食市场的组织化、规范化将无从抓起，期货市场也无从出现。反之，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现货批发市场中存在的风险和价格稳定等问题也难以解决，更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胡平表示，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可先办粮食现货交易的批发市场，同时逐步发展远期合同，将来有可能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经济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引向期货市场。

在时任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任李经谋看来，期货市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高效的通信、结算、仓储、运输等综合配套设施，同时还要进行理论、舆论和人才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的，而当时又处于体制转换时期，不具备建设完备的现代期货市场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但也不能等着条件都具备之后再开办期货市场。

李经谋认为，1993年，在巩固、完善和成功发展现货批发市场，积极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的基础上，推出标准化合约，试办期货市场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在政策上对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建立期货市场有明确要求；二是随着改革步伐加快和力度加大，企业经营机制转变后，回避和减少风险的需求与日俱增；三是近年来证券和各种商品市场发展很快，人们的风险投资意识不断增强；四是粮食商品量和商品率大大提高，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五是粮食已实行购销统价，并将加快市场调节的步伐；六是仓储设施、运输能力、通信系统结算条件已初具规模，市场法规建设和管理人才培养已经起步；七是郑州市场的成功运行也向期货市场过度积累了一定经验。

借鉴国际经验 促进我国期货试点的实践

建立规范的期货市场是一个崭新的事物。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期货市场的建设。

然而，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陈宝瑛认为，应该遵循“先试点后发展”“先初级后高级”“先立法后创办”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发展我国期货市场。

试办粮食期货交易市场，既要遵循国际期货市场的基本原则，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在运行机制和交易手段的设计上起点要高，在实践过程中要分步骤实施，逐步完善。

期货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期货市场已经发展到包括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和期权期货等十分广泛的交易内容，并拥有现代化的电脑通信设备和十分方便的仓储运输条件。

采访中，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1990年10月建立的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引用了国际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例如，实

行交易会员制、结算会员制、交易保证金制度、集中交易制和统一结算制度等。

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与西方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是现货市场很落后，市场秩序远未形成，所以在期货试点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必须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作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来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以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来推动现货市场的不断完善，以现货市场正常高效的运行来保障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走两个市场机制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路子。”陈宝瑛称。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一个具体组织形式，是借鉴国外经验，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继续推进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陈宝瑛看来，郑州商品交易所就是把国际惯例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在现货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发展期货市场的道路，即首先建立批发市场，在现货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推出期货交易。以规范发展现货市场为起点，有规范高效的现货交易做后盾，企图操纵市场的投机大户就难以得逞。他说：“坚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有机结合，是两个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证明了，从现货市场起步逐渐向期货市场发展的决策的正确性。作为国家试点单位，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功运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作为中国“第一粮市”的开拓者、践行者和领跑者，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向期货市场发展引导着行业发展，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系列专访之六：为中国期市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记者 曲德辉

回顾 30 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杜岩说，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对世界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中国商品市场进行改革，完成从统购统销向价格双轨制、从不成熟的现货市场到市场经济高级形态期货市场的跨越，对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实践者而言，堪称“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极具风险性”的工作。

1978 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88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行至中流，为突破计划经济的价格壁垒，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探索开展期货交易。1990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落户郑州。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把握住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勇当排头兵，敢为先行者，在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条件下，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现货到期货的跨越，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交予的试点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郑州商品交易所规范发展，开拓创新，正实现从期货到期权，从场内到场外，从国内到国际的新跨越，向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中心这一发展目标昂首迈进。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郑州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发展之路，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杜岩回忆说。

勇担使命 争做期市探索排头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始了粮食价格体制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价格市场化和市场化

流通有利于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但是粮食价格波动将使企业和百姓面临越来越多的价格风险，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基础上启动购销市场化，则面临着缺乏统一市场，交易活动分散无序的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期货交易的需求日益强烈。当时，李鹏总理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组织研究期货制度，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也从分管领导处接受了研究期货市场的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任务派给了常务干事田源，而国家体改委的任务则落到了杜岩头上。

“1988年年初，我和田源碰了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干脆一起搞。在请示了各自领导后，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小组。”杜岩回忆说。

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理论研究的大幕正式拉开。

“研究小组通过几次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李鹏总理最终同意了这一报告。”杜岩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当时我们考虑开展期货市场试点，面临着很多具体工作，而国家体改委不适合直接出面。我拿着总理圈阅的文件找到了商业部部长胡平，请商业部出面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同意了，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泮、吴硕、赵尔烈，政策研究室的朱玉辰等也加入了研究小组。”

据杜岩回忆，当时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选择期货市场试点地区时，意见是有分歧的。有同志认为，与沿海城市相比，郑州地处内陆，试点的阻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相比之下，河南省最重视期货市场试

点工作，时任河南省常务副省长秦科才多次带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研究会议。河南省粮油期货市场课题组研究得最深入，拿出的试点方案获中央机构专家一致好评。最终考虑到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调出大省，而且地处中原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郑州获准成为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

“三公”楷模 敢为规范发展先行者

20世纪90年代初期，郑州得风气之先，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在随后的时间里，郑州商品交易所开拓创新、规范发展，引领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潮流，成为被广泛效仿的样本。

1993年3月1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启用“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名称，同年5月28日成功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实现了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市场发展的试点目标。回顾历史，郑州商品交易所不仅是我国期货市场的发源地，而且出台了我国第一部期货交易规则，开发了我国第一套电子化期货交易系统，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地方期货法规，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同业学习的榜样。

199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以发展期货交易为目标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上海金属交易所等。它们普遍引用了国际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在形成规范交易秩序和有影响的预期价格方面，显露出远比一般批发市场巨大的优越性。这些交易所的出现，不仅繁荣了现货市场，而且为最终实现贸易方式变革、逐步过渡到期货交易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粮食价格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粮油批发价格、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价格组成的‘郑州价

格’，充分发挥了价格发现作用，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得到中央部分领导的认可和很高的评价。”杜岩说。

回顾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清理整顿是不能回避的阶段。杜岩表示，回头来看，当时期货市场没有全国集中统一监管，且法律法规缺位，部分地方未经任何审批就兴办交易所，运作中只重视短期利益和同业竞争，导致期货市场陷入了盲目发展阶段。

郑州商品交易所在成立之初，就将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确定为立市之本，“三公原则”后来也成为行业共同遵守的准则。在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年代，郑州商品交易所不负国家试点厚望，在市场中始终树立规范、自律的良好形象。

孜孜不倦 研究中国期货市场监督管理体制

“在期货市场初露盲目发展端倪的时刻，国家体改委经与有关部门多次沟通，组织起草了期货市场法律法规，设计了独立的期货监管机构、期货业协会等方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期货市场后来交由中国证监会管理。”杜岩说。

杜岩在199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有效的组织、监督和管理体系是期货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期货市场是市场发育的高级形态，它具有回避价格风险和发挥预期价格的功能，同时它又是高风险行业，因此，国际上对期货市场不仅有严格的法律和规则，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尽管各国在具体组织管理框架上有一些差别，但大体都是采用政府专门管理机构统一监管、期货业协会行业管理、期货交易所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体系。

在期货市场法规建设方面，杜岩认为，从中国发展期货市场的进程看，现在急需对期货市场进行必要的法律规范，以保护期货业的正常运行和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目前进行全国性期货立法，条件尚不具备。根据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整个立法工作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先制定《期货市场管理的试行办法》，作为期货立法的前期准备；第二步在经过试运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由国务院颁发《期货市场管理条例》，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步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正式立法条件具备时，由全国人大批准实施《期货市场法》。

期货市场盲目发展阶段兴起的境外经纪业务，杜岩认为，逐步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运作，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方向。但在我国期货市场刚刚起步，尚缺乏经验和人才，法规也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境外客商进入境内期货业和境内客商从事境外期货业务，都应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当前要严格加以限制，原则上不允许境外客商与境内企业合资办交易所或期货经纪公司。当我国期货市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建立了统一的期货管理机构和制定了统一的期货交易法规以后，再考虑放宽政策。

25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对杜岩在1993年时的采访，他对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阶段、管理体制建设的判断十分准确，与日后期货市场的发展路径惊人的相似。这表明中国第一代改革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当时已十分深入，这为期货市场日后的稳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忆犹新 向中国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致敬

在杜岩看来，中国期货市场试点推出的前前后后，留下了第一代改革者的身影。这些同志主要分三类：一是政府部门和地方领导，包

括白美清、胡平、高尚全、秦科才等同志；二是理论政策研究人员，包括田源、常清、廖英敏、刘俊英等同志和地方一大批具体课题研究人员等；三是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创建人员，包括李经谋、乔刚、郑元亨等同志。

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杜岩说，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对世界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中国商品市场进行改革，完成从统购统销向价格双轨制、从不成熟的现货市场到市场经济高级形态期货市场的跨越，对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实践者而言，堪称“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极具风险性”的工作。

在那个特定年代，郑商所在李经谋等同志的带领下，自觉担当起为改革实验的崇高使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参考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探索中持续前进，在破解难题中屡开新局，在批评质疑中坚定前行，不仅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交予的试点任务，而且在期货交易规则、期货法规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实现零的突破，发挥了试点对改革全局的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谈及中国期货市场正以“扩大全球定价影响力为发展目标”时，杜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1995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商品期货定价中心东移”的判断。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中心将向亚太地区的中国转移，与之相伴的是世界商品期货定价中心向中国转移。他当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商品价格的波动会相对变小，而中国的商品价格波动会越来越大，这也会提高中国在世界商品期货定价体系中的地位。

系列专访之七：情有独钟郑商所 和衷共济开大船

记者 王伟

1994年年初，博士毕业后，张邦辉直接进入中国证监会期货部。此后，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扎根服务期货市场，从监管层的视角，见证了中国期货市场“由乱到治，规范发展”的全过程。

2006年，张邦辉由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空降郑州商品交易所，任职副总经理，后任理事长、监事长，直至2014年退休。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他作为管理者之一，参与了郑商所走出低谷、重塑辉煌的全过程。

期货市场之于张邦辉，是付出21年，并继续发挥余热的沃土。张邦辉之于期货市场，是无数个呕心沥血的奉献者之一，正是因为这些奉献者的同心协力，才有了如今中国期货市场的生机勃勃。

谈感情、谈缘分，对郑商所情有独钟

2006年2月14日，张邦辉任职郑商所副总经理，当时他是作为现任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的副手出任这一职务的。对于在西方“情人节”这个特别的日子从中国证监会期货部空降郑商所，在张邦辉的心里一直都是美好而温馨的回忆。

实际上，对于郑商所，张邦辉一直怀有情有独钟的特别感情。当中国证监会选派干部到郑商所任职例行谈话时，张邦辉说，他到郑商所任职的意愿是强烈的，态度是坚决的，正如时任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在任职大会上所说的那样——“邦辉对郑商所情有独钟”。

这种情有独钟和义无反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张邦辉的记忆里，有三件事情催生了他对郑商所这种特殊的情感：

一是张邦辉进入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后，时任郑商所总经理的李经谋带着团队去证监会述职。在张邦辉的印象里，郑商所述职的团队服装统一，队容整齐，朝气蓬勃之气扑面而来，尤其是各部门人员对郑商所的管理、外联和结算等的介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是张邦辉曾任河南大学客座教授，在此期间，多次往返中原大地，有了更多深入了解河南与郑商所的机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有个师弟叫王天义，他是河南大学副教授。王天义介绍我兼任河南大学客座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追溯起来，我和郑商所以及河南的感情渊源还是很深厚的。”张邦辉深情回忆道。

三是2001年张邦辉任职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时，适逢郑商所小麦品种发生风险事件，中国证监会派出一支工作组，深入指导工作，化解风险，这支工作组的组长正是张邦辉。据他回忆，这支工作组是截至目前中国期货市场监管部门对交易所派出的唯一一个工作组，足见监管部门对郑商所工作的重视。作为组长，张邦辉和魏峰、杨光等，紧紧依靠郑商所广大员工，克服困难，化解风险，提拔原纪委书记王献立为代总经理主持工作。带着任务和使命，在具体化解风险时，张邦辉对郑商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很多员工建立了友谊。“我们的初心就是希望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能快速走出低谷，走向兴旺发达。”他神色凝重地说。此后一段时间，郑商所的工作一直未见起色，他也深感郁闷和无奈，于是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弄清原因，竭尽全力助郑商所走出低谷。

张邦辉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他在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任职时，因为对郑商所格外关注，也有人和他开玩笑说，是不是对郑商所有所偏爱？对此，张邦辉并未否认，他确实对地处中国中部的郑商所给予了

特别的关心。他说：“和沿海地区相比，郑商所在外部发展环境上弱一些。同样几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身体偏弱的孩子获得更多关爱无可厚非。”

只是那时的张邦辉可能还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他将用职业生涯后半生全部的爱，为他一直偏爱的郑商所付出更多努力和心血，而郑商所也在全体总动员下，回馈他一串串闪亮的足迹、一个个耀眼的成绩，向全世界展示出无限的发展潜能和光明前景。

聊创新、聊贡献，赞郑商所功不可没

毋庸讳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野蛮生长，乱象丛生的结果必然会迎来严厉监管和清理整顿。在张邦辉看来，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在中国所有行业中持续时间最长，但却为此后期货行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根基。“在中国期货市场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中，郑商所可以说贡献巨大。”张邦辉认为，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郑商所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走在了市场创新的前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交易所规则制度的制定和调整都是以郑商所的规则制度为范本。郑商所的先知、先觉、先行和经验被模仿、被借鉴，郑商所的不足、失误和教训也被放大，乃至嘲笑。

二是郑商所在国际交流方面广泛且呈体系，不仅最早翻译出版境外期货市场方面的丛书，还积极参加国际期权交易协会，走出去“开眼看世界”，为国内期货交易所了解国际市场探索了路径，做出了示范。张邦辉说，郑商所在很长时间内堪称“国内最了解国际市场、与国外期货市场交流最多、掌握国际期货市场信息最丰富的期货交易所”。最值得一提的还包括具有前瞻性地创办了《期货日报》。

三是作为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郑商所发展规模一度最大，成功的经验也最多。在市场清理整顿时期，可以说一手擎起整个期货市场的希望，在当时期货市场贡献最大。

除此之外，张邦辉还特别提到郑商所另一个容易被忽略但需要被思考的贡献，那就是郑商所初创时期的“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是指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一套机构”是指同一个管理机构。“这是当时最朴素的期现结合形式，期货市场必须立足现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密不可分，期货交易出现大风险，多是因为脱离了现货市场。目前来看，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但郑商所早期在期现结合方面的探索，诸如栈单交易等没能坚持下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张邦辉说。

在郑商所的发展历程中，张邦辉亲身经历了一些新品种的上市工作，见证了郑商所的努力和奋进，比如，强筋小麦上市是张邦辉鸣的锣。

对于郑商所的明星品种——棉花和白糖期货的上市，张邦辉也竭尽所能做了很多协调工作。他说：“棉花是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后交易所上市的第一个新品种，上市牵涉的部门比较多，上到供销总社，下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需要沟通协调的事情多而繁杂，有需要证监会期货部出面协调的无不竭尽全力；白糖期货也是如此，对于白糖在郑商所上市，当时的白糖主产区是有一些抵触情绪的，担心风险事件，我们就从监管角度给主产区讲风险可控，推进白糖期货上市完全没问题。”

张邦辉表示，在中国证监会期货部时，了解过不同交易所的风险事件，也具体负责过化解风险，积累了相应的经验，比如，郑商所硬

麦 309 合约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应王献立请求，时任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的张邦辉和时任交易所监管处处长的冉华共赴郑商所，头一天现场谈话，第二天一早又飞回北京。2006 年，任职郑商所副总经理时，张邦辉分管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管理交易所风险，及至后来任职郑商所理事长，他工作的侧重点也是风险控制。在他看来，随着中国期货市场日渐成熟，虽然不能说杜绝了所有风险，但郑商所 2006 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交易风险事件。

在张邦辉看来，期货交易所的交易规模和市场风险管理成正比，风险管理越到位，市场运行就越平稳，交易、交割就越顺畅，交易规模也就越大。“一个市场如果风险频发，投资者不敢来，肯定做不大。”他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在郑商所任职时对防控风险极其重视，用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把过去发生的风险案例一一梳理，追根溯源，吸取教训，从严管控风险。一线工作人员也都是尽职尽责、敢于担当、配合默契，将多起风险消除在萌芽阶段。

论信心、论前景，看郑商所再创辉煌

2006 年，时任郑商所总经理的赵争平和张邦辉对郑商所现状和前景有过多次数深入交谈。对于一直关注且有所偏爱的郑商所，张邦辉充满信心，他向赵争平分析说，郑商所情况较为特殊，底子不错，眼下虽然面临一些实际困难，但只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郑商所一定能重新站起来，重塑昔日的辉煌。事实确实如此，赵争平首先统一了郑商所领导班子的思想，进而得到中层干部的赞同，以及全体员工的认同和支持。在赵争平的率领下，郑商所上下同心，齐心协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终于凤凰涅槃，走出困境。

彼时的郑商所虽然新上市了棉花期货品种，但市场培育需要一个过程，白糖期货也是这样的状况。在其位，谋其政，刚刚任职的两人还没完全安顿下来，就下定决心让郑商所尽快走出低谷。为守护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应有的荣耀，在赵争平带领下，郑商所全体人员找原因，树规则，见客户，听意见，终于使得郑商所走上快速、规范发展的轨道。

在张邦辉的记忆里，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深刻，对推动郑商所快速走出低谷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是树立“三公”原则。对此，张邦辉回忆说，当时郑商所存在被市场误解的成分，比如，部分客户集中的期货公司甚至不敢和不愿做郑商所的品种；又比如，一些职能部门因为对河南有偏见，从而对郑商所也存在偏见；再比如，一些投资者曾经在郑州市场亏了钱，就放大了对郑商所的不良情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凡此种种，若想改观，需要从制度上打开“心路”。张邦辉认为，对此首要是树立“三公”原则，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眼前的问题。“我们定了很多规矩，从制度上做了调整，堵住哪怕最细微的漏洞，严格落实‘三公’举措，不给违反‘三公’事件留有任何余地，对交易所内部更是严格要求，凡发现违规行为，一律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他说，这样的举措得到郑商所全体人员的支持，“三公”原则的贯彻改变了郑商所的形象，也改变了外界对郑商所的看法，交易开始重新活跃，形象也重新树立起来，2006年郑商所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二是走进市场，征求意见。张邦辉说，当时深入市场征求客户意见是真心的，绝不是走过场。走进市场的部门不仅包括直接服务市场的会员部，而且包括交割和结算部门等，大家一起走进期货公司和企

业客户，真诚听取意见和建议。在交易所人员“走出去”的同时，还把产业客户乃至大户“请进来”，给交易规则提意见，并根据市场发生的变化，对规则进行及时调整，以更加符合现货商的需要。“我们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邀请各地证监局分管期货的副局长和期货处处长，带着辖区期货公司到郑商所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同时来河南走走，用心感受郑商所乃至河南的新变化；再比如，购买一些能反映河南文化的书籍和音像制品邮寄给客户，以便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河南，改变原有的偏见。”张邦辉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走心的举措为郑商所良好形象的树立发挥了正面作用。

三是修改规章制度，以更好贴近现货。张邦辉表示，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郑商所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改进和完善规则，让市场感受到郑商所绝不偏袒某一方，规则制度既贴近产业客户需要，期货公司也能够接受，对其开拓市场大有裨益，各方协力，推动郑商所重新走上发展“快车道”。

对于郑商所的明星品种 PTA 期货，张邦辉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以粮食品种交易为主，郑商所被称为粮食期货交易所，如何突破限制走向综合性期货交易所，可以说 PTA 做出了成功尝试。当时市场也有质疑国际上没有 PTA 期货，上市这个品种有没有必要，能不能成功，郑商所坚定信念，牢牢抓住机遇，全力以赴。有的同志一个月跑好几次产地调研，不断修改报告，有的同志连孩子的关键升学考试也顾不上，牺牲了小家，最终成就了一个国际化品种。”张邦辉认为，PTA 的上市为郑商所打开了通向综合性期货交易所的大门。

最让张邦辉兴奋的是，当郑商所走上快速规范发展的道路、形势有了明显改善之后，赵争平又主持建设了新办公楼和技术中心工程，并切实提高员工收入和福利水平，使广大员工充分享受到交易所规范发展的红利，极大调动了工作积极性，自此，郑商所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系列专访之八：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记者 李靖琴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是西方人活 400 年才能经历的，而两个差异巨大的时代，中国人只用了 40 年。从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到郑州商品交易所，从期货市场的治理整顿到平稳规范发展，从单一的商品期货到期权来临，从王献立 1994 年 7 月到郑商所担任副总裁一直到 2010 年从理事长的位置上退休，跨越了 16 年的时光，这 16 年沉淀下来的难以忘怀的记忆，几番滋味，今又涌上心头。

建平台：《期货导报》诞生记

国内唯一的期货行业报纸《期货导报》（后更名为《期货日报》）的诞生，是改革开放大潮催生的结果。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后来的郑商所）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试点期货交易所探索期货交易之初，当时的交易所总裁李经谋就提议，要创办期货行业自己的报纸，以便更好地对期货行业进行宣传 and 引导。这个建议得到了时任河南省省长李长春的赞同与支持。

1993 年 12 月 7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1993 年 12 月 31 日，河南省新闻出版局下发通知，同意郑商所作为主管与主办单位创办《期货导报》。考虑到办报不属于郑商所的核心业务，郑商所决定成立《期货导报》社独立运营。在报社初创的关键时刻，1994 年 7

月，王献立从河南省委政研室调任郑商所副总裁，并担任《期货导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据记者了解，当时办报难度相当大，不仅报社人员缺乏办报经验，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郑商所要求1994年下半年就要正式出版发行报纸。在这段时期，一向持稳而行的王献立显示出了他雷厉风行的另一面。在郑商所的支持下，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建立起了报社的领导班子，“指挥部”建立起来了，一切指令就有了出处；机构设置、办公场地、规章制度也很快确定了，“唱戏的台子”也搭起来了；除了郑商所调配的人员，报社筹备组又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各岗位人员，这是报社的第一次人才储备。以上工作，用时还不到两个月，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1994年9月26日，《期货导报》创刊号出版发行。至今，王献立仍清楚地记得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文章是“中国加快期货立法进程”，内容主要是全国人大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期货交易法（草案）》的意见，同时配发了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柳随年、副主任董辅初参加《期货交易法（草案）》研讨会的图片。

“那时，我要对每期头版文章进行审阅，文章版式修来改去，大家都想做到最好，总是忙至深夜，但每个人都干劲十足，那真是一段有期待、有梦想的岁月！”王献立感慨回望。

树典型：把延津模式做成经典样板

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河南省作为农业和人口大省，始终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在就期货市场如何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进行调研时，郑商所发现，河南省延津县粮食贸易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然后通过套期保值锁定价格，促进了全县

强筋优质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郑商所把这种做法总结为“公司+农户、订单+期货”的延津模式。

2000年，郑商所推出了优质强筋小麦期货。由于当时实行小麦计划收购，农民种什么品种，当地粮食企业就收什么品种，而优质强筋小麦则不同，它与进口小麦的设定是同一个标准，收上来之后可以直接替代进口小麦，当然价格要比一般小麦高得多，农民种植这种小麦收入也会相应提高。延津县尝试种植优质强筋小麦的农民开始尝到了甜头。随着订单农业的发展，粮食企业每年收购上来的优质小麦数量不断增加。如果农民以每斤小麦1元的价格签订定单，企业以每斤1.1元的价格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当期货价格下跌到每斤0.9元的时候，损失是由期市交易者来承担的，农民利益没有受损，而当期货价格上涨时，农民却可以得到分红。

这就是典型的延津模式，通过期货公司使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联结起来，同时利用期货进行避险。在实现利润增长的同时，扩大强筋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升级”的效应。这种做法得到了中国证监会领导和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领导的支持。2004—2005年，郑商所选择河南省的周口和商丘、山东省的菏泽以及河北省的衡水作为试点，宣传推广延津模式。

延津模式推动了期货市场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功能发挥，得到了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的关注，这也为他后来支持棉花期货上市埋下了伏笔。

攻坚战：棉花期货上市开启新征程

在清理整顿期，期货市场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没有上市过一个新品种。对比上海的铜、大连的大豆，郑商所更是没有一个交易活跃的品种。不过，经过不断争取，中国证监会同意郑商所可以上市一个期货新品种。

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在 2000 年第一次考察郑商所时，就建议上市棉花期货。棉花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当时由国家直接调拨和管理，国家供销社设立棉花交易中心专门负责，但供销社对上市棉花期货持反对意见。从区域上分析，新疆是棉花主产区，全国 60% 的棉花产自新疆，而郑州并非主产区，更重要的是当时新疆也在努力争取推出棉花期货。申请期货品种上市必须征得品种主管部门的同意，但当时国家发改委、供销社等部委对上市棉花期货持否定态度。可以想见，棉花期货上市的阻力和压力之大。

在郑商所上市棉花期货，看起来就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幸，郑商所得到了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的大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的加快，上市棉花期货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棉花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上市棉花期货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相较于白糖等其他农业品种意义更重大。因此，从申请到立项，王献立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更是为此写了四封信：第一封信是写给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第二封信是以河南省政府名义发文请示国务院，在郑商所上棉花期货；第三封信是写给时任国家发改委市场司司长毕景泉；第四封信是写给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他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部委阐述上市棉花期货的意义，认为期货价格可以为棉农种棉提供价格参考，减少棉农种棉的盲目性和被动性，是一件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还得到了当时分管农业和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支持。2002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马忠臣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温家宝副总理兼任组长。郑商所将国外棉花期货运行的情况向马忠臣做了详细汇报，请他转达给温家宝副总理。马忠臣听后表示，棉花期货既然有助于同国际接轨，而且国际市场已经正常运行，那么国内也可以尝试。马忠臣向温家宝副总理汇报后，又将意见及时反馈给郑商所，说温家宝副总理表示可以考虑上市棉花期货。随后，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研究室了解棉花期货的有关情况。不久，国务院的批文下来了，同意郑商所上市棉花期货。从2001年至2004年，前后历经3年时间，这场棉花期货的攻坚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棉花期货于2004年6月1日正式上市。

“一个人必须坚强，否则他永远不会变强”，这句话其实处处适用，勇敢地越过种种磕磕绊绊，“棉宝宝”的诞生开启了郑商所变强变大的新征程。

使命在心，重任在肩。近20年的从业生涯，多少个夜晚，未来大厦办公楼透出的灯光，见证了王献立和他的团队走过怎样艰辛的路、付出过怎样的心血。现在，郑商所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永远不能忘却的仍是那份初心。